

郭沫若——信仰的追求者与实践者

武 衡

(学部委员)

一

我第一次见到郭沫若同志是在 1938 年的春天,为争取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组织的公开合法化到武汉活动。

“民先”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青年组织。它是在 1935 年“12·9”运动后,由参加“12·9”运动的部分学生决定组建的。当时,“民先”是非法的,不能公开活动。抗日战争开始,“民先”总队部由北平移至山西省临汾。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民先”总队部决定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派代表团到当时国民党中央所在地武汉展开活动,争取“民先”的公开合法化,以利大规模地开展抗日救国运动。我作为总队部的代表之一,在总队长李昌的领导下在平津流亡到武汉的大学教授们和文化界民主人士中间开展工作。

1938 年的 2 月,我们到达武汉。我与文化教育界的上层人士广泛接触,其中之一就是去拜见郭沫若先生。郭沫若是在 1927 年大革命后流亡到日本的。1937 年“7·7”事变后,他为了参加抗战从日本偷渡回国,在武汉担任了国民党总政治部第三厅(即宣传厅)的厅长。郭沫若在文学艺术界的进步人士中有着很高的声望。在他担任厅长期间,团结了一大批文化界的左派人士和许许多多文学艺术界的进步人士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方针,无论是在解放区还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后方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郭沫若当时住在原日租界(抗战爆发后被我国收回)的一所日本式的房子里,他在那里接待了我。我当时是 20 来岁的年轻人,对他很尊敬,而他对于年轻人则表现出真诚的爱护和异常的关怀。我首先向他尽可能详细地介绍了当时华北,特别是沦陷区的广大青年学生在敌占区和敌后动员群众,流血抗战,为民族的解放作出的巨大牺牲和无私奉献等情况,汇报了“民先”的组织状况、任务及其活动等等。郭沫若因回国还不到半年,所以对国内的抗日救国活动、对“民先”的组织感到很大兴趣。在听了我的介绍后,他立即表示同情“民先”,赞誉“民先”,并且愿意为“民先”在抗日战争中能够获得公开合法活动的地位予以支持。我们谈得很融洽。谈话开始时,我不知道郭老的听力不好,跟他说话,他听不清楚,于是,我只好大声地跟他讲,后来才知道他是在大革命期间,也就是参加北伐战争时耳朵被震聋。虽然,“民先”最终没有能够实现公开合法化,在国民党政府撤离武汉时,宣布了“民先”组织的非法。尽管这样,郭沫若在我心目中依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一方面是由于知道他刚刚从日本偷渡回国参加抗日的伟大壮举;一方面是这次会谈取得了他的同情和支持。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郭沫若。此后很长时间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二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郭沫若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当时我在东北担任东北科学研究所所长,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到北京向他汇报过东北科研工作的情况。我记得他当时对东北的工作很赞赏,因为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是以中央研究院与北平研究院合并而成的,科学研究人员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科学研究脱离实际,工作作风也都是旧的。而东北的科学研究所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强调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理论联系实际、发扬延安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首先实行有计划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这些对东北工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郭沫若对东北的科研工作很赞赏。他在1952年1月20日为东北科学研究所题词中写道:“东北科学研究工作解放以来很有成就,东北从事科学研究的同志们很能配合实际需要,使科学研究能为工业、农业、国防等方面的建设服务,成为了新中国科学工作者的先锋。希望能在取得的成就上更进一步努力,团结全国的科学工作者共同奋斗,完成伟大祖国的工业化,逐步走上社会主义建设与共产主义建设历程的神圣任务。”这幅题词对东北科学研究所和全东北的科学技术人员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并且是巨大的鼓舞。

三

我有幸在郭沫若领导下工作是在1954年以后。1954年我被调到北京担任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副秘书长,在与郭沫若的接触中,他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当时虽然是个党外人士,但他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无限忠诚的,对于党组织的决定总是无条件地服从,认真地贯彻。我当时是科学院党组成员,当中央有什么指示、党组有些什么决定向他传达或征求意见时,他总是坚决拥护和支持。对于党组交给他的工作,例如,请他对当时的政治运动发表谈话、对科学家做工作等,他总是认真去做,从不推辞。一位民主人士能够对党如此忠诚、执行党的决定如此坚决,使我非常感动。当时我认为,郭沫若是一位真正的党外布尔什维克。郭老在科学院的表现对于许多科学家、对于我们许多党员干部都是深刻的党性教育。

1957年党内开始整风,整顿所谓“三风五气”。党组书记张劲夫同志曾在科学院院务会议上向党外人士作了传达并征求他们的意见。郭老参加了这次会议。我记得,郭老在听完传达之后做了发言,讲得非常非常的激动,真可谓痛心疾首、声泪俱下了。他说:我跟着共产党这么多年,而且一直和周总理一起工作,但是,在党的教育、帮助下,我却不进步,很惭愧,对不起党,到现在我还不是一名共产党员,……。当时郭老的情绪感染了在座的人,我也为他的这番话深深感动。当时科学规划委员会已经成立,我兼该委员会的副秘书长,我情不自尽地赶快跑回国务院去见聂荣臻同志,向他汇报科学院布置整风的情况和郭老在会议上的发言。我说对这种事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但我觉得应该予以适当解决,应向郭老做做工作。聂荣臻听后很明确地说,郭老这个问题早就应该解决了,我向总理去汇报,要解决他的组织问题。此后不久,聂总就向周总理讲了。为此,中央做出决定,批准吸收郭沫若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因郭沫若长期是以民主人士代表人物的身份在国内外各种场合中出现的,吸收这样一个人作为党员,必须向社会及国外公布。因此中央于1958年12月27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了这个消息,同时公布李四光、李德全入党。这样,郭沫若、李四光、李德全等同时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人

民日报》发表这个消息后，在全国、特别是在高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中引起很大的反响。从那以后，郭沫若同志就不再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了，他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党组的工作。

许多人都知道郭沫若在大革命时期曾经参加过党组织，以后脱党。1937年回国后，直到他再次入党前，他总是用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但在公开场合又必须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20年如一日，长期思想上的压抑，情不自禁地在一次会议上迸发出来了，但他并没有怨言，而只是悔恨自己、严格要求自己。当一个人毕生的追求，一旦得以实现，他的心情该是何等激动啊！

1966年“文革”开始后，党组织被迫停止了活动，1972年中国科学院重新建立党的领导组织，党组改称为党的核心小组，郭沫若被任命为党的核心小组书记。我作为副书记之一，一直协助他工作。粉碎“四人帮”后，他更以万分激动的心情高呼“科学的春天到来了”，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呐喊啊，这是时代的声音，历史的呼唤。

四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同志与世长辞。在他去逝的当天，我到他的病榻前向他告别，可惜他已不能说话了，于立群同志向他最后一吻，从此，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开追悼会前，中央办公厅专门召开了一个小会（记不清正式的名义了），主要是讨论郭沫若的党籍问题。因为郭老早在1927年就曾入党，1957年是他第二次入党。我记得参加讨论的有胡乔木、李一氓同志，还有中国科学院、中国文化界的有关同志。讨论郭沫若同志的讣告是写1927年入党呢，还是写1957年入党呢？党龄究竟从何时算起？李一氓主要发言，回顾了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及入党的经过。

南昌起义前，郭沫若在张发奎的部队里，他在那时就比较进步，同情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变。当时他曾发表了一篇反对蒋介石的文章，指出今天的中国究竟是谁的天下，是你国民党反动派的，还是人民的。那时公开反对蒋介石是不容易的，郭沫若一石击水，在文化界、知识界、舆论界以至全国激起巨大波澜。南昌起义开始时，郭沫若和李一氓正在九江，他们要求去南昌参加起义，张发奎碍于郭沫若等在全国的影响，不敢阻止，同意他们去南昌。但当时两军已处于对峙状态，张亲自给他们开了通行证，他们凭着这张通行证，坐着铁路的“压车”通过“封锁线”，到了南昌。郭沫若于1927年8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郭沫若中途脱党是因为大革命失败后，发生“4·12”大屠杀，因为他是知名人士，党组织通知他到苏联去。因中途受阻去了日本。这是形势所迫，郭个人是难以改变的。在日本他从事甲骨文的研究很有成就。1937年“7·7”事变后，他毅然抛弃妻子和儿女，渡海回国，参加抗战，他是热爱祖国、忠于共产党的，是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的。

经过讨论，会议认为郭沫若的党籍应从1927年算起，并经中央批准。在郭沫若同志的追悼会上，邓小平致的悼词中写的是：郭沫若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人民日报》1978年6月19日）悼词对郭沫若的一生作出了这样的评价：“郭沫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一生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同上）我认为，这一评价切实反映了郭沫若的一生。郭沫若不仅是一位学者、诗人、社会活动家，而且还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变自己的信仰，而且忍辱负重，坚韧不拔，他对自己要求极严，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他的优秀品质，使我永远铭记，值得我永远学习。